

〔法〕古伯察著 耿 昇译



鞞鞞西藏旅行记

中国藏学出版社

汉译国外藏学名著丛书

22.865
160
1

鞞鞞西藏旅行记

〔法〕古伯察著

耿昇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55490

译者的话

古伯察 (Régis—Evariste Huc, 1813—1860 年) 是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他于 1813 年 6 月 1 日生于法国的开鲁斯; 1839 年 3 月 24 日离开法国赴中国, 于同年 8 月 1 日到达澳门。他又于 1841 年 2 月 20 日离开澳门, 于同年 6 月 17 日到达当时直隶省赤峰市附近的黑水川西湾子的法国传教区 (当时法国的北京传教区已被驱逐到那里)。古伯察神父于 1844 年 8 月 3 日在其长上秦神父 (Joseph Gabet, 1808—1853 年) 的陪同下开始横穿中华帝国的旅行。他经过热河、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和 18 个月的长途跋涉, 于 1846 年 1 月 29 日到达西藏首府拉萨。在拉萨居住近 2 个月之后, 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的命令予以驱逐, 被解往四川。他们一行于 1846 年 3 月 15 日离开拉萨, 经过 3 个多月的旅行于 1846 年 6 月初到达四川的打箭炉。然后他们从打箭炉出发, 经过四川、湖北、江西, 于 1846 年 9 月末到达广州, 最后于同年 10 月中旬到达澳门, 从而完成了 1841—1846 年的这次环中国的长途旅行。他于 1860 年 3 月 25 日去世, 享年 47 岁。

有关古伯察和秦神父生平及这次旅行的具体情节, 本书 1924 年北京遣使会印刷厂版本的刊布者包士杰 (J. M. Planchet) 神父已作了详细介绍, 读者可以参阅, 本处就不再赘言了。

古伯察等一行在从蒙古赴西藏的这次旅行中, 由青海碾伯县的察罕胡尔人 (Dchiahour, 实际上是指察罕蒙古尔人, 白胡尔或白霍尔人, 即土族人) 桑达钦巴 (Samdadchiemba, 琦善奏

折及清代汉文载籍中作萨木丹尽巴)陪同,他被驻藏大臣从拉萨驱回原籍。后来的一些西方旅行家们曾查访过他的行踪,他也曾陪同其他旅行家和探险家们在蒙古及西藏旅行过。

古伯察神父于1847—1849年间在澳门写成了他的这部传世名著《鞑靼西藏旅行记》,此书于1851年首次用法文在巴黎刊行。他从四川到澳门一段的游记《中华帝国——鞑靼西藏旅行记续》于1854年也首次用法文在巴黎出版。

古伯察还有另外一部4卷本的重要著作:《中国中原、鞑靼和西藏的基督教》,于1857年首次在巴黎以法文出版。后来被多次重刊并译成了多种文字。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中原、鞑靼和西藏地区的书简以及数篇论著,有不少都刊载于当时的《传信年鉴》和《遣使会年鉴》中了。

古伯察是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法国人,也是最早从那里活出来的几个欧洲人之一。他与秦神父的这次旅行当然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尤其是希望进入盛行佛教的西藏布教。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自耳闻目睹的主要情节都记录下来了。他对沿途中国各族人民,尤其是蒙藏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山川风貌、社会经济、驿站里程等都作了详细记述,这也是西方最早作过如此详细记载的人。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刚一出版就立即轰动一时,成了西方热门的议论话题,褒贬不一。此书的法文版自1851年首次出版后又又在法国多次重版,此后18年间竟出了7个法文版本。入华遣使会士包士杰于1924年在北京遣使会印刷厂重刊一次并作了注释。法国于1980年又将此书与《中华帝国——鞑靼蒙古旅行记续》同时重版。美国1988年再版英文本。

据法国著名学者考狄于1909年的统计,《鞑靼西藏旅行记》在问世之后半个多世纪时就被先后译作英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俄文本,后又被译作日文。

而且大部分译本也都曾多次重版。从那时以后，也不断出版英译文和法文本新版本。特别是自 1860 年译成英文之后该书的影响在西方更为扩大。昭和 14 年（1939 年）后藤富男将该书译作日文，由生活出版社出版，从而又开始在东方广为流传。同样据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于《西洋人论中国书目》（5 卷本，1904—1924 年）统计，该书在当时就已有十几种版本，尚不包括大量对该书的译介文。法国的中国学泰斗伯希和曾给了本书很高的评价（见 1925—1926 年《通报》）。我们从该书如此之多的版本中，即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和重要性了。由于各种原因，这本直接记载中国的书却一直未有一个汉译本，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当然，古伯察等一行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传教，特别是在蒙藏两族中传教。所以，他将汉族与蒙藏两个民族进行比较时，往往是严重倾向蒙古族和藏族人而指责非难汉族人。这完全是由于他以蒙藏两族的“归化人”之身份自居的结果。我们从其书的字里行间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外国学者们已经多次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倾向。如包士杰先生在本书的注释中也作了毫不含糊的说明。大家在阅读此书时，对此应作分析批驳，以免造成误会。

古伯察等是于 1841 年—1846 年间从事这次旅行的。当时正逢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了极点，摇摇欲坠，衰微破败。鸦片战争刚刚爆发，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签订。中国陷入了一种国破山河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境地。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各族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外祸内乱，形势日趋严重。中国各族人民都灾难深重，作为中国边陲地方的少数民族（在本书中主要涉及到了蒙藏两族）的生活则更为悲惨。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最

悲惨的时代之一。根据这样的历史背景，大家对于古伯察书中描述的中国大量落后阴暗面就不会感到奇怪和过多地指责他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整个中国的面貌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都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几个或几十个世纪，今天的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已与古伯察时代具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社会风俗、民族关系、社会安定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彻底变化。所以大家不必用今天的观点看待古伯察书中对于落后阴暗面的记述。历史就是历史，只有正确地对待历史上的现象，才能正确地评价今天的变化。此外，本书也是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黑暗和民众苦难的真实写照与见证。温故而知新，我们通过新旧社会的这种比较就会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的新中国。当然，古伯察作为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和顽固的欧洲文明中心论者，他也在有意地渲染、夸大和别有用心地搜罗他经过地区的落后风俗和面貌。他夸大其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地方也很多，甚至也有恶意攻击之处。不过就该书的全局来看，其记述基本真实。这也是大家阅读本书时应注意分辨和批判的地方。

对古伯察神父等人的这次旅行以及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引起了诸家学者的纷注。大家都在传播和评介其书，或褒或贬，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如俄国的普热瓦爾斯基、法国的奥尔良王子与伯希和、英国的裕尔、德国的克拉普洛特、比利时的一大批传教士、日本的后藤富男和美国柔克义等。有不少人甚至还曾沿古伯察的道路旅行过一段距离。他们广征博引，广泛挖掘和搜罗西方人的资料。但他们都忽略了最有权威的、最为翔实可靠的记述，即中国典籍档案中的记载。像本书这样非西方的官方代表，而是个人私自来华的外国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事迹，中国书中一般都很少有记载。古伯察其人其事形成了仅

有的几个例外之一。中国当时的许多载籍中都有过大量记述，而且与本书中的叙述非常吻合。我们于此略举几例，以作补记，供读者参考。

曾直接与古伯察等人打交道并奉清廷的诏令，而把他从西藏驱逐出去的清廷驻藏大臣琦善，为此而呈奏清朝官廷的奏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见证。

《清实录》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乙丑（1846年4月29日。这与古伯察神父著作的时间完全吻合）记载：“又谕：琦善等奏，盘获喇嘛（即法兰西，France）洋人并起出洋书洋文，录供呈览一摺。据称：‘该洋人等由福建、广东等处至京，复由盛京会遇，经历口外，同至西藏，冀图传教。现将该洋人等于讯后委员解川’等语。该洋人于汉语、清文、蒙古文字皆能通晓，恐未必实系喇嘛。著宝兴于解到川省时，将其来历及经过处详细研鞫，务得确情，即行具奏。原摺并供单均著钞给阅看，木匣所贮洋信、洋书等件著一并发给。将此谕令知之”（卷428，第3—4叶）。

《清实录》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闰五月乙巳（1846年7月14日）记载：“谕军机大臣等：前据琦善等奏，盘获喇嘛洋人至藏传教，该将洋人于讯供后委员解赴四川。当降旨令宝兴于该犯解到时，将其来历及经过处所详讯确情具奏。兹据奏称：‘研讯该洋人等所供，与驻藏大臣所讯大略相同。察其须眉眼色，确系洋人，并非内地奸徒假冒’等语。此人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学习各处文字、语言，意究何居？所供仅止劝人为善，别无他意。所传人数、姓名不能记忆，恐难凭信。至该国王发给戒表，持赴广东交与驻扎总官前往各处传教，是否实有其事，著耆英、黄恩彤于解到时，将洋人等详细研鞫，并暗加体访。该洋人是否实系该国所遣，及有无送银接济之事，并将匣内所贮洋信、洋书等件交通晓洋字之人逐件译明，庶可得其底细。如

果确系喇嘛人，并无别项情节，即著斟酌情形妥为办理。原摺及供单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卷 430，第 11—12 叶）。

《筹办夷务始末》卷 75 载有《琦善等奏盘获传教法人并起出文书录供呈揽摺》：

“驻藏大臣琦善、帮办大臣瑞元奏：

窃西藏年班堪布等由京回藏，奴才等风闻有随行可疑之人，当飭噶布伦汪曲结布查获三人，呈送前来。奴才等公同查验，具系蒙古喇嘛打扮，询问皆能汉语，于清文、蒙古文字均能讲诵，惟唐古特文字语言尚未熟悉。一名约则噶毕（Joseph Gabet，即秦神父），一名额雍哩斯塔 [Evariste-Régis (Huc)，即古伯察]，共祖弟兄，喇嘛人，在所属之奔底舍哩（疑为 Pondicherry，即印度之本地治里。当时许多传教士都是经印度入华的）地方居住，素习天主教。约则噶毕于道光十六年，由福建起程，经江西、湖北等省至京。其弟额雍哩斯塔，于道光二十一年由广东起程，经湖北至京，在盛京地方彼此会遇。遂一同行住，于热河、察哈尔、归化城及蒙古地方，均经往来。至二十二年在察哈尔地方，雇用现获之甘肃碾伯县番民萨木丹尽巴（Samded-chimba，本书译作桑达钦巴）为之服役。上年 [二十五年] 行至西宁，闻唐古特番商由京回藏，遂一同前来，即被拏获。

诘以该国距中华路途险远，人生地疏，不在本处焚修，转复前来何为？且藏经传自西域，与该夷住陞匪遥，何必舍近而图远？金供中国各处，均有学习彼教之人，冀图益广其传。而讯以同教姓名，又称未能记忆。检其行李，清字蒙古字及印版夷文天主教经典甚多，无甚关要，当即发还。惟内有夷字二张，讯系该犯等家信，并该国携来传教凭据。夷字五张，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语言，无人识认。质之服役之番民萨木丹尽巴，据供受雇佣工属实，不能知其底里。奴才等查该犯等，甫

经西藏，即被盘获，既无可质讯之处，即所供经过各所亦系一面之词，而起出夷书夷字，又复无人辨识，若悬揣推求，转不足以成信谏。再口外道路穹远，跬步皆山，一经奉提，解送耽延。西藏既无可质讯之处，谨不揣冒昧，于讯供后，即分起委员解交四川督臣暂为收管，俟命下之日，由彼提解，较为便捷。合并陈明”。

（廷寄：据琦善等摺，著宝兴详鞠所获法人。）

琦善下令将古伯察一行解往四川，清廷诏令四川总督宝兴查办。四川总督宝兴也就他对古伯察一行人的查办情况上表呈奏朝廷。《筹办夷务始末》卷75在道光二十六年乙巳（闰五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846年7月14日）下记载有《宝兴奏严讯在藏所获法人情形摺》。

“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奏：

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初四日，奉上谕：琦善等奏，盘获佛咄哂夷人，并起出夷书夷文，录供呈览一折。著宝兴于解到川省时，将其来历及经过处所，详细严鞠，务得确情，即行具奏等因。钦此。

兹于五月二十一日，由藏将该夷人等解到，臣随督同在省司道向其询问，该夷人等皆能汉语。据供一名噶毕约则（Joseph Gabet，即秦神父），一名额窪哩斯塔（Evariste，古伯察），均係佛咄哂人，同习天主教，认为兄弟，均在外传教，道光二十一年在关东小北口等地会遇。余供与驻藏大臣所讯无异，噶毕约则系于道光十六年到广东，嗣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到京，又由京至热河、关东、蒙古、察哈尔、归化城、鄂尔多斯、兰州、丹噶尔地方，随同唐古特番商到藏。所到之处，或住数日、数月及年余不等。汉文汉语系在京学习，满洲及蒙古字语皆在关东学会，并无一定师传。额窪哩斯塔系于道光二十一年附该国兵船到粤，随亦由广东、江西等省至京，出

归化城一带传教，嗣与噶毕约则会遇，即同住同行，其汉语系在北口外学会。至番民萨木丹尽巴，系甘肃碾伯县人，因早年随喇嘛赴蒙古地方流落，经该夷人等雇令服役。

臣以该夷人等远出传教，意究何居？且多年在此，日用更从何出？何以久不回国，究竟有无一定年限？其所传之徒，已有若干？西藏系喇嘛所居，该夷人等一同赴彼，又欲何为？复又详细研诘，据称伊国习教之人，以传教为修善，所传益广，功德益深，并不向习教人索取银钱。如情愿出外传教，呈明国王，发给戒表，持赴广东，交与在粤驻扎总管，前往各处传教，并无一定年限。倘在途缺用，寄信与广东总管，即送银接济。伊国出外传教之人，各省皆有，无非劝人为善，别无他意，尽人可传，既传之后，亦不复措念。伊等会遇同教及所传人数姓名，均不能记忆。至西藏地方，向有伊国之人居住，伊等到彼，本欲俟传教后，即从廓尔喀回国，因唐古特字语未能通晓，尚未传人，即被驻藏大臣查获解川等语。拆阅木匣，所贮夷书夷信等件，无人认识，诘之该夷人，皆供伊等家书及传教凭据。

伏查该夷人等所供各情，是否属实，无可质证。传授天主教现亦例所不禁，且察验该夷人等须眉眼色，迥与中国人不同，其为外国夷人并非内地奸徒假冒，亦确无疑，似无须再事推求。惟夷字夷书内，究竟系何言语，自应同该夷人等一并解交广东省，查传通晓夷字之人译明。如果并无别情，即交佛朗西人认领回国，以昭覈实。至萨木丹尽巴讯止受雇服役，于该夷人等底细不能知晓，应即解回原籍甘肃碾伯县，交保管束”（廷寄：据宝兴摺，著耆英等详鞠在藏所获传教法入）。

四川总督宝兴遵照清朝皇帝的圣旨将古伯察等一行押解出川。古伯察等人经湖北、江西进入广东，最后到达澳门。两广总督耆英等继续奉旨查办。他们在处理完备这一案件之后也向朝廷呈奏了一道本摺。《筹办夷务始末》卷77于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1846年）十月戊辰（十六日，即公元12月4日）以下记载有《耆英等奏讯明至藏传教之法人酌办情形摺》。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奏：

准江西转准前途各省，将至藏传教之喇嘛夷人喇嘛喇（Josph Gabet，秦神父）、额窪哩斯塔（Evariste，古伯察）二名，咨解到粤。当飭臬司严良训会同委员候补道赵长龄，督同广州府将该夷等详细研鞫，据供伊等于道光十六年及二十一年，先后来到中国传习天主教，到过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等省，由京师赴关东，彼此会遇。复由边外蒙古地方行走，至甘肃兰州等处，同往西藏，致被拏解等供。覆与四川督臣及驻藏大臣所讯，供词大略相同。诘以该夷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学习各处语言文字，意究何居？据供伊国以传教为功德，多传一人即多一功德。是以不惜远道，来至中国，前赴各省传教。又因伊国语言文字中国人不能通晓，是以学习中国文字并各省语音，无非为便于传教起见，并无他意。伊等所习天主教，实系劝人为善，至所过各省，均时来时去，并无久留。所传人数，亦无册籍登记载，实在不能追忆姓名。诘以广东向来喇嘛贸易之人甚属无多，其领事设自近年，从前并无夷目羁留于此。所称驻扎总管，系属何人？何以该国王有发给戒表来粤照验之事？至伊等远赴内地，时阅数年，路经万里，盘费亦属不赀，何能尽由本国带来？究系何处何人接济？令其确切一一指出。据供伊等所携戒表，如中国僧人度牒，澳门各国夷人同教不少，见此度牒，便可收留居住。其实十六年二十一年伊等来粤时，伊国委无驻扎总管，前在川省属混供。至所需盘费，缘伊等雍发改装，又麤通中国及满、蒙语言文字，与内地僧人无异，随时募化，均有人施捨。伊等俱系单身，无多化（花）费，是以不至困乏，兼有赢余，并非另有别人接济。伊并称：闻本国领事现在澳门，伊等沿途感受风寒，尚须在省医治，恳求暂

交荷兰国领事收领等情。由司详解前来，臣等亲提研鞫无异。

遵复暗加体访，该夷实系呷唎哂人，并非奸徒冒混。随将匣内所贮夷信夷书，转交委员平庆泾道潘仕成，密传通知缙译，因与红毛文字不同，未能辨认。复经该道转交咪喇哩（美利坚）夷目识认，据称夷信系该夷等从前在粤所接家信及该国王所给传教文凭，而该夷等所称戒表。夷书乃系天主教常行之书，西洋称为《福音书》，词句较多，一时不及缙译，现有伊等旧存译就汉字刻本呈阅等语，并据该委员向该夷目取到汉字夷书一本，查阅文词鄙俚，尚无违悖字句。当飭将该夷噶毕哟喇、额窪哩斯塔二名，发交荷兰国夷目收领，转交呷唎哂夷目管束，旋接呷唎哂夷目吡咕（应为 Becourt 之对音，法国 1843—1846 年驻广州领事。一般应作北古）声称：该夷等实系由伊国前来中国传教，今蒙递还，不胜感激等情。

伏查天主教自前明利玛窦（Matteo Ricci）传入中国，已历数百年之久，而澳门之大小巴寺均建立多年，向为番僧麇聚之处，华夷错杂，真伪难分。上年〔二十五年〕呷唎哂夷首请将习教为善之人，免予治罪，臣等即料各国夷人必有潜赴内地传教者，是以定议时，特于约内注明，不许夷人远赴内地传教，严立限制，以备将来遇有拏获，免致借口。此次噶毕哟喇等及前次大吕宋国夷人纳巴罗，先后经西藏及湖北查拏解粤，均经讯明于数年前赴内地传教，系在未定条约之先。当即发交夷目收领，并飭按照条约严加管束。该夷目等以成约在先，各无异说，以后遇有似此案件，办理尚可不致棘手。”

“廷寄：答耆英等摺。

谕军机大臣等：耆英等奏，讯明至藏传教之呷唎哂夷人，酌办情形一摺，览奏已悉。此次赴藏传教之呷夷噶毕哟喇、额窪哩斯塔二名，由川省咨解到粤，经该督等讯明，该夷人虽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实止冀图传教，并无别情，亦非奸徒冒混。并

将夷信等件交咪喇哩夷目识认，旋据呈出译汉刻本，查阅词句，尚无违悖，自属可信，现已将该夷等交该夷目管束，自应如此办理。惟各国夷人不准潜赴内地传教，载在条约，限制甚严，虽此次赴藏之噶喇嘛等，及前次由湖北掣获之大吕宋夷人纳巴萨（罗），计期均在未定约之先。以后惟当谕知各该夷人，除五口地方准其建堂礼拜外，断不准擅至各省任意遨游。务令该夷目自行约束，属遵条约，以息事端而免借口，是为至要！”

此外，后人张其勤的《清代藏事辑要》、《东华录》以及清季有关夷务、天主教和外事档案中都有关于古伯察事迹的记载。本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真可谓上自龙廷，地方首脑，下至黎民，朝野轰动。

由此可见，在中外史书中都有记载的古伯察神父的这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以及他的这部《鞑靼西藏旅行记》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该书是讲中国及其两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藏族及其地区的，既然国外有了那么多版本，所以我们认为有一个汉译本也是理所应当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深信这一汉译本对于我国藏学和蒙古学的研究是有裨益的。

我们早就有意翻译出版此书，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不久，就意欲组织出版一套国外西藏研究的译著。承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美意，接受出版本书的汉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不辞辛苦地审阅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避免了许多纰漏。邓锐龄先生曾极力推荐翻译本书。本书的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对于他们这种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本人在此特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吴丰培先生、宋芮同志、王尧先生曾慷慨地指导和帮助过我们，谨于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作者并不是蒙古学家或西藏学家，充其量只能是传教士和旅行家。他所记述的许多事并不非常确切，有些说法甚至是荒谬的。为了不使译文篇幅过于冗长和罗嗦，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就不再作解释了，读者可以去自行考证研究。

该书的法译本很多，本来应采纳 1980 年出版的最新版本。令人遗憾的是新版本没有注释。斟酌再三，我们最终决定采用 1924 年遣使会设在北京西什库的遣使会书局出版的包士杰本。书中的注释及某些章节后面的“附录”均系由包士杰所作。包士杰是法国遣使会士，1870 年生，1894 年莅华，先在上海传教，后于 1896 年到达北京，任遣使会的司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教皇派代表驻北京，包士杰任代表团秘书，最后于 1932 年回归法国。他的主要著作有《庚子北京殉难录》（1922—1923 年，两卷本）等。他刊行的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的版本质量相当好，是该书众多版本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位中国通。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昇 1988 年岁末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新版本序言

在开始阅读古伯察先生的游记之前，读者最好是首先认识一下本历险记的两名主人翁，了解大家对他们的评论以及最终使他们获得公正评价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于此以导言的形式提供这两名传教士传记的某些细节，接着引证奥尔良公爵著作中的某些摘录^②，概述此著受到的最严厉攻击，并提供曾在实地证实了这两名传教士所说情况的可靠的权威答复。

秦神父与古伯察的传记

秦神父（Joseph Gabet，秦噶哗）是古伯察这次穿越中国的著名旅行中的旅伴和长上，他于1808年12月6日诞生于伦勒索尼埃（圣—克洛德教区）的内维。他在完成其神学学业以后，于1833年10月27日受任神父神品。他于1834年3月间加入了遣使会，1835年3月21日乘爱德蒙号船出发前往中国，同行的有后来在武昌殉教的享真福者董文学（Perboyre）和后来签订1860年条约时任翻译的艾氏（Delamarre），于同年8月19日到达澳门。他在该城中居住了整整一年，于1836年3月16日在那里发宗教愿，于8月15日出发前往蒙古传教区并于1837年3月间到任。其汉姓是秦。

他在黑水和热河多年布道之后，成功地归化了3名喇嘛，其中之一就是遣使会冯会士，曾被孟振生（Mouly）主教任命为蒙古的宗座代牧并奉命开创蒙古传教区。秦神父提出申请并获许

由古伯察先生作为其教友。

秦神父在从澳门寄给他的继承人达京(Daguin)的一封书简中,用下面这段话解释了他赴远方执行使徒使命的起因:“我们从喇咧沟出发前往喀尔喀人中,由于我们肯定会被当成俄国人,所以我们更愿意取道西部。我们经过了察哈尔,接着又渡过了黄河,经过了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诸旗,最后来到了一个叫作塔尔寺的著名喇嘛寺。我们希望在那里创建蒙古的第一个基督教会。我们在那里度过了8个月,最终发现无法实现自己胸怀中抱有的希望,甚至再不能于那里居住了,因为那里想强迫我们身着喇嘛服装,所以我们被迫到其它地方寻求安身之地。当时汉族人与藏族爆发的冲突使我们不可能再返回去了,我们被迫转向西方,进入了卡尔梅克大沙漠。经过数月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西藏的首府拉萨。我们在那里进行初步尝试之后,就为发现取得了超出自己希望的成就而感到宽慰。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在这一佛教之都首次唱起了真正的祈祷经文……”。

当秦神父一旦从西藏回到澳门之后,便在香港传信部司库樊力西亚尼(Feliciani)的建议下而乘船赴法,以向那里报告这一已开始衰败的传教区形势,然后再去罗马申请返回中国的权力。但在此期间,西藏的宗座代牧区已创立并委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持。

至此,秦神父奉命陪同一批圣女前往巴西(1849年)并创建了马里安纳神学院。他于1853年3月3日因患黄热病而死于里约热内卢。

*

*

*

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于1813年6月1日生于开鲁斯(图鲁兹区),出身于原籍为马提尼克岛的一个家庭。其父原为

法军参谋部的上尉，在结婚数年之后定居于图鲁兹，以有利于对其儿子们的教育。古伯察在该城的小神学院中完成了其学业，后来于1836年10月9日在巴黎参加了遣使会传教区的修会，于1838年10月15日发宗教愿，于1839年1月28日被盖伦主教授神父神品。

数周之后（3月24日），他离开了巴黎并与里昂的普里瓦（Privas）先生和沃特兰（Vautrain）修士等两名传教士在勒阿佛尔乘阿德玛尔（Adhémair）号双桅横帆船同行出发。他后来写道：“在5个半月间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大洋、巽他海峡和中国海，我们终于在1839年8月1日这一天到达了澳门”。

古伯察于澳门违犯中国人的礼仪而在中国遣使会传教区的巡使陶若翰（Torette）先生面前发誓，他也是在那里获悉了其教友享真福者董文学于武昌殉教的消息，他甚至还想自己穿上已殉教者的服装。该神父于1841年2月20日星期六离开了澳门，于同年6月17日到达了西湾子。大家在那里为他起了一汉名：古伯察。

他在西湾子或在该县中停留了近两年，这是既为了在那里熟悉传教区的生活，又是为了在那里学习汉语。他在1843年的耶稣升天节之前不久，便出发前往黑水和喇咧沟传教区。他在那里一直致力于学习满语和蒙古语，一直到他在其县长的陪同下开创蒙古传教区为止。

1844年8月3日，秦神父和古伯察离开了黑水（Houlitou）^⑧，经过喇咧沟，以从事他们那次直到1846年10月才在澳门宣告结束的长途跋涉。他在该城中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以用于整理其旅行笔记并撰写《鞑靼西藏旅行记》（1847——1849年）一书。